



萨缪尔·贝克特：“第一位重要的后现代小说家”，也是欧洲荒诞派戏剧的代表作家之一，对现代世界文坛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的生日（4月13日）成了“贝克特戏剧节”，是全世界实验派戏剧爱好者和学者欣赏贝克特名剧的盛大节日，而他消瘦且棱角分明的面相——“深深的额头纹、修剪整齐的灰白头发、长长的喙形鼻子以及海鸥似的眼睛”——也成了20世纪欧洲文坛的经典面相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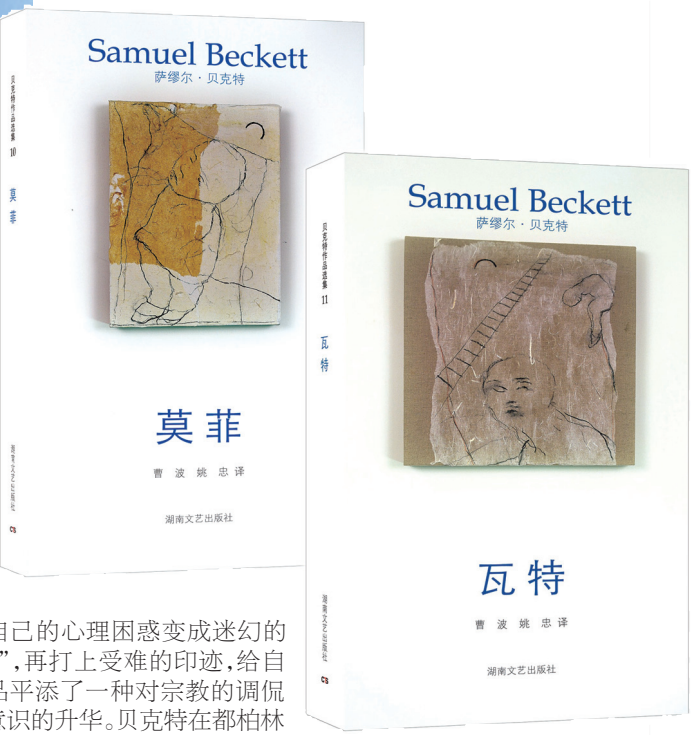
贝克特以戏剧处女作《等待戈多》扬名欧美，但他首先是一位“荒诞主义小说家”，是二战前后欧洲最杰出、最具有独创精神的小说家。他的戏剧有很多片段根植于前期小说，或者说，他的戏剧和小说之间有很强的互文性；没品味过他的实验小说的滋味，就难以充分体会他的荒诞戏剧的精神。因此，贝克特戏剧的研究者和爱好者不妨回过头来，从他的前期小说中寻找走出迷宫的线团，而试图革新的作家和喜好黑色幽默的普通读者，也可以从中收获不少创作的灵感、心理的豁然和哲学的冷峻。

贝克特1906年出生于爱尔兰首都都柏林南郊的一个村庄。少年时代，他常常感到郁郁寡欢和莫名痛苦，虽和母亲隔阂愈深，但和父亲感情甚笃，只可惜父亲英年早逝，使他遭受了沉重的心理打击。贝克特的生日恰好是耶稣受难日，因此

萨缪尔·贝克特：

寻找容纳混乱的形式

曹波



他常把自己的心理困惑变成迷幻的“梦意象”，再打上受难的印迹，给自己的作品平添了一种对宗教的调侃和个人意识的升华。贝克特在都柏林市中心的厄尔福特学校上中学，后转到王尔德的母校波特拉皇家学校寄宿。1923年，他进入都柏林三一学院攻读法语和意大利语，由于才华出众，第三学年获得“现代语言奖学金”，毕业时以全班第一的成绩荣获“学院金质奖章”。

1928年，贝克特获得两年的互派奖学金，由三一学院派往著名的巴黎高师（后现代精神分析学家拉康的母校）担任英语教师，期间他结识了爱尔兰作家、意识流小说大师詹姆斯·乔伊斯，深受乔伊斯“文字革命”的影响。回国前，贝克特完成了自己惟一的论文《论普鲁斯特》，该论文体现了他对悲观哲学的认同，也暗示了他日后创作的方向。1933年，贝克特抑郁症发作，来到伦敦接受心理治疗，期间他阅读了弗洛伊德等人的心理学著作，还聆听了荣格的心理学讲座，这些经历触发了他探索人类潜意识灵感，使他的作品具有浓厚的心理分析的色彩。

1936年，贝克特完成了长篇小说处女作《莫菲》，但两年内连续遭到42家出版社的拒绝。1937年，他在德国各地游

历，对绘画和音乐表现出非凡的理解力和与众不同的感知视角，次年移居巴黎，开始步入小说创作的高峰期，二战期间创作实验小说《瓦特》，为后续作品奠定了基础。这期间，贝克特的创作经历了一场意义深远的升华，实现了从全知全能的第三人称叙述向第一人称叙述的飞跃，也实现了从英语创作到法语创作的转换。在文字游戏和文学典故方面，他早期的作品常流露出乔伊斯的影响，而战后的作品却很少卖弄学识，反把无知、无能和失败当作创作的主旨，展现在昏暗、困惑和痛苦中絮絮叨叨的飘浮的思绪。

1946年至1950年，贝克特完成了具有鲜明“元小说”特征的小说三部曲《莫洛伊》《马龙之死》和《无法称呼的人》，以及划时代的“20世纪最具革命性和影响力的戏剧”——《等待戈多》，从而奠定了他在欧美文坛（尤其是剧坛）不可动摇的地位。此后，他还创作了不少经典戏剧，如舞台剧《终局》《幸福的日子》，广播剧《所有倒下的人》《余烬》，等等。可以说，

“贝克特革新了战后戏剧，是许多小说家、画家和视觉艺术家公认的导向标……与叶芝、乔伊斯一道成为20世纪彻底改变了文学的三位爱尔兰作家”。

贝克特是爱尔兰英语作家，或者说，是侨居巴黎的爱尔兰裔法语作家。他承认，“爱尔兰籍贯给自己的创作留下了深刻印记”，而且他终生“持爱尔兰护照”。除欧洲大陆的各类文艺流派，他还受到了许多爱尔兰前辈作家的影响，如《格列佛游记》的作者斯威夫特、戏剧家约翰·辛格、诺贝尔奖诗人威廉·叶芝、画家杰克·叶芝、意识流代表作家乔伊斯等。因此，尽管他遵循了“极简主义”的原则，在早期作品中也时常提到伦敦，但细心的读者和观众还是能体会到，在文化上贝克特是属于爱尔兰的。不仅他的早期小说多以爱尔兰为背景，如《莫菲》以及《瓦特》中关于纳克博的故事，而且他的中后期戏剧也常常如此，如1956年创作的《所有倒下的人》就以他童年时的故乡为背景，是他最具自传色彩和鲜明爱尔兰特征的戏剧之一，而1959年创作的广播剧《余烬》虽然背景更模糊，但依然可以断定是以都柏林南部海滩为背景的。此外，贝克特小说的语言和戏剧中的对白都明显带有爱尔兰英语的节奏和句法特点，如小说《瓦特》中连绵不绝的流水句以及舞台剧《来来往往》中三个女人的对话等等。可以说，在骨子里，贝克特是爱尔兰作家。只是在“去殖民”意识还不浓厚的年代，这位英语作家被英语的故乡勉强笑纳了。

《莫菲》(Murphy, 1935年创作，1938年出版)是贝克特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具有荒诞、黑色幽默和心理分析的色彩。莫菲是身居伦敦的爱尔兰小伙，笃信占星术，总想远离决定论的物质世界，生活在绝对自由的精神世界里，就是说，他追求的实际上就是虚空。妓女西莉亚莫名其妙地爱上了莫菲，鼓励他寻找体面的工作，开始新的人生，但莫菲厌倦机械的工作和理性的追求，最后逃到了精神病院当护士。但发现自己终究不属于病人的“自由”世界后，莫菲回到住所，把自己绑在摇椅上，在煤气爆炸中死去。他的骨灰被同胞撒在了酒吧里，灵魂依然归于躁动，而没有在虚空中获得安宁。与此故事

平行，有一干男人和女人相互追逐，陷入了所谓“爱情的短路”。他们代表着跟莫菲的追求截然相反的理性世界，过着机械的、宿命论的生活。为了摆脱爱情的困境，他们必须找到莫菲，但莫菲行踪不定，使他们无以解脱。莫菲居无定所，后又逃到精神病院自杀身亡，最终使他们大失所望，回归永无出路的现实世界。

这部小说形式上比较传统，展现了一个由物质与精神、机械与自由、务实与虚空等构成的二元对立世界，体现出作者对自由与虚空的向往。贝克特后来的许多实验都能在这里找到源头，可以说，《莫菲》是传统小说与实验小说的萌芽的结合。

《瓦特》(Watt, 1943年创作，1953年出版)是贝克特的第二部长篇小说，荒诞的色彩更加浓厚，实验的成分也极多，是作者摆脱叙事传统和乔伊斯的影响、独立地迈向后现代主义的标志性作品。该小说比较充分地体现了贝克特小说三部曲的混沌主题：主体的身份是混沌的，世界是混乱的，认知是不可能的，语言是解体的了，人生是殉难式的。给该小说贴上“荒诞派”、“存在主义”、“后结构主义”、“潜意识探索”、“反理性”等标签，都不无道理，甚至可以说，该小说是“后”派读者取之不尽的宝藏。

该小说有内外两个叙事层面：内层叙事是故事的主体，由瓦特叙述。他在梦境般的世界里寻找存在的意义和世界的本质，是荒诞世界的探索者。他下了火车，离开“外部世界”（理性的意识的世界），莫名其妙地进入了代表“内部世界”（国内外论者所说的“小世界”、“微宇宙”，即潜意识的世界）的诺特的宅子，在一楼和二楼分别担任了一年的仆役，期间发现了许多不可思议的现象，如这个小世界的运作规律、钢琴调音师的父子关系、诺特的流质食物、诺特本身的模糊身份与特征、罐子的命名危机、另一个仆役房间里的绘画和铃铛、养狗人的家族史等等，真是一个卡夫卡式的世界。瓦特百思不得其解，陷入了严重的认知危机，语言能力逐步瓦解，说话开始颠三倒四。终于，来了一个接班的仆役，瓦特便离开诺特的宅子来到车站，莫名其妙地走了，消失在外部世界。外层叙事在小说的后

半部分才出现，由山姆叙述。话语开始紊乱后，瓦特似乎被关进了一处庭院式的精神病院。山姆住在相邻的庭院里，他惊奇地发现，不仅两个庭院极其相像，而且俩人之间也存在不言自明的耶稣殉难式的“镜像”关系。闲暇时，他听瓦特讲述诺特宅子里的故事。瓦特企图借助数学式逻辑推理来解释他对内部世界的疑惑，但由于记忆力和理解能力的衰退，他的叙述终究模糊不清。而山姆也不是传统的全知全能的叙述者，他也无法理清瓦特故事的头绪，有时只能瞎说一通，且无法掌控故事的选材，将本来无关的长达20多页的亚瑟故事（严重的跑题，跑题中还有跑题）插入主体情节，使本已混乱的故事更添一层混沌。因而，整部小说线索不清，谜团重重，两个层面都跟“透明”的“可读”文本沾不上边，而其叙事也摆脱了叙事者作为理性的主体的叙事传统。

原文有外层叙事者留下的脚注、空缺，还有未能整理、未能纳入主体情节的原始素材“补编”，无疑具有元小说的典型特征，但这些素材本身就混乱不堪，不但不能澄清主体情节，反而使内外两层叙事更加扑朔迷离。可以说，贝克特提前二三十年，就在《瓦特》中以文学的形式开始演绎拉康的后现代精神分析学、德里达的解构主义、福柯的疯狂说及元小说等“后”派理论的关键词了。

对一般读者而言，《瓦特》的“可读”性是很弱的，但是，要读懂贝克特的小说三部曲，了解他形式实验的过程及对文学传统的彻底革命，《瓦特》又不能不读。为广大读者甚至论者起见，译者不免违背“信”的至上原则，一方面以叙事学意义上的“事件”为单位，给小说划分了小节，留出空行，并作了注明，担负起“导读”的责任；一方面又对小说中的数学游戏、逻辑游戏、心理游戏等进行了必要的注释，尤其对普通读者难以卒读的排列、组合游戏进行了注解。

贝克特不以所谓的“文笔优美”见长，而是以反理性、对潜意识的革命性探索、对文艺及哲学的广泛涉猎、对文学形式的彻底革新等等著称。他曾惜字如金地说，“要当艺术家就要失败”，艺术家的任务就是“寻找能够容纳混乱的形式”，而“形式即内容，内容即形式”。译者增添大量的注释，只是形式上的不“信”，旨在引导读者走向贝克特心中挥之不去的疑问（Watt即What）：人类到底是怎么回事儿？世界到底是如何运转的？理性到底出了什么问题？逻辑为何无果而终？意义为什么没法确定？倘若能减少一些误读或难以卒读的现象，让更多的读者走近这位诺贝尔奖获奖作家，走近欧洲文学史上这位划时代的小说家和戏剧家，译者的心血也就没有白费。

■ 奖声书影

从《上海离哪里遥远》到《地方法官》

王越

德国女作家乌苏拉·克雷歇尔(Ursula Krechel)以二战为题材、描述战后返乡难民的小说《地方法官》(Landgericht)夺得了德国2012年度图书大奖。德国年度图书大奖由德国图书业联合会颁发给当年最佳德语小说，并在德国最大的书展——法兰克福书展的开幕式上颁出。克雷歇尔的另一部题材作品《上海离哪里遥远》(Shanghai fern von wo)，描写了二战期间在上海避难的犹太人，曾获得2009年德国奖金最高的文学奖——约塞夫·布赖特巴赫奖。

克雷歇尔1947年出生于德国特里尔，先后做过记者、自由作家。《地方法官》讲述一位二战期间出逃到古巴的犹太法官科尼策战后回到德国，担任地方法官。他希冀通过战争审判求得公正，洗刷往日不公耻辱，但最终一切都成为泡影。他的家庭在战争中分崩离析，妻子留在了德国，一双儿女则被英国的慈善机构收养；战争结束后，他以为终于可以一家团聚，但却事与愿违。书中还描写了科尼策在古巴的流亡生活，与铅灰色的现实相比，古巴的生活仿佛五光十色的梦幻。在古巴，科尼策有了新的家庭，与现任妻子的关系构成了本书的情感内核。《上海离哪里遥远》则以纳粹时期最后一批逃离德国前往上海的犹太人为主角，围绕几个家庭展开，这些律师、学者、工匠没有护照，身上只有随身的箱子和几十个马克，在全然陌生的国度跌跌撞撞熬过最艰难的岁月。

60多年来，德国人一直在对二战这场人类浩劫进行反思。从战争结束伊始的废墟文学，到新一代成长起来后对父辈的历史产生严重质疑和否定的代际小说，德语文学中不断深入反思二战、多角度发掘历史的作品层出不穷，其中不乏销量与口碑俱佳者。克雷歇尔的小说是如何从中脱颖而出的呢？

克雷歇尔的这两部作品都以



战争中的边缘人、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为描写对象。《地方法官》中的科尼策，战后回国不仅是为了回到故乡，更是为了洗去之前在纳粹时代受到的侮辱与冤屈，重拾尊严。然而时代并没有给他这个机会，他努力融入战后社会却阻力重重，作为个人，他深深陷入了面对历史和时代洪流的无力与疏离感。《上海离哪里遥远》中，上海的犹太难民身处多重夹缝，流落异国，没有了国籍，没有了家，纳粹的盟友日本也在步步紧逼，达摩克利斯之剑仿佛时刻高悬在头顶，令他们惶惶不可终日。即便如此，他们仍要在完全陌生的文化当中挣扎着生存下去。克雷歇尔在获奖后说，她希望这些小说能唤起人们对于流亡者这样一个群体的关注。

克雷歇尔这两部作品的一个关键词是“家”。《上海离哪里遥远》中有这样一段话，也是这部小说的点睛之笔：

“我们要去上海了。”
“上海？那么远？”
“远？离哪里遥远？”

这群失了“家”的人，从此失去了地理上和心理上的起始坐标。如果说《上海离哪里遥远》是流亡，是身份认同的危机，与之相对，《地方法官》即是回归，是重塑家庭和身份认同。然而主人公回归后发现他

已经与曾经的家乡在社会意义、情感等各个层面都断裂开来，他弥补家庭成员间裂痕的努力也宣告失败。

在《地方法官》与《上海离哪里遥远》这两部小说里，克雷歇尔都采用了纪实和文献式的手法。她本人并未直接经历过二战，所有的情节都是基于后天的素材收集。为了写《地方法官》，克雷歇尔用超过10年的时间进行采访、查找旧档案和案宗、搜集文献。这种写作方式有时会导致一个问题，那就是如何在史料与文学化的叙述间取得平衡。克雷歇尔做到了，最终呈现出来的效果非常令人信服。《地方法官》中的纳粹和普通德国人在反犹历史中的种种表现，《上海离哪里遥远》中的历史事件与中国的风土人情，都同主人公的命运丝丝相扣。她在尊重史实的基础上描摹了人物情感，深入了角色内心，将历史与合理想象完美糅合起来。

克雷歇尔同样表现出了对语言强大的驾驭能力，她游刃有余地游走于叙事、文献、散文和分析等不同文体，时而充满诗意，时而冷静克制。对于书中众多人物的悲惨经历，她尽量采取旁观者的客观角度，只叙述事实，点到即止，决不铺张开来大肆煽情，从而也让小说真实可信。德国当地报纸就对她塑造



乌苏拉·克雷歇尔

人物时的这种“理性的移情”及洗练的叙事大为赞扬。

时光流转了半个多世纪，受害者曾经的血与泪，已成了档案馆最深处的发黄卷宗，在孤独的一角落满灰尘。世界几十年来的变化翻天覆地，过去的事情，究竟有没有必要再提起？有人会说，要向你看，不要沉迷于往事，更何况是不堪的往事。但是克雷歇尔这样有良知的作者会记得，那些苦难不仅是历史书上的冷冰冰的数据，也是压抑、背叛、爱、别离、迷茫等人类共通的情感经历。正如克雷歇尔在采访中所说：流亡是一个人性的母题，折射出人性的复杂与多变。那些往事通过作者的笔，穿越了时空，与新时代的读者产生了共鸣。

当然，克氏此次获奖得到的也并非众口一词的称许。不少评论家认为斯蒂芬·托姆(Stephan Thome)更应当获得这个奖。他们还表达了对评奖标准的质疑：图书奖，是纯文学意义上的奖，还是兼顾其他？技巧、语言、思想深度、社会意义，孰轻孰重？

纵观德国近20年来的小说发展，总体上反思历史的作品较先锋实验的作品更受主流评论界青睐。反思作品不乏思想深度，但总体来说在叙事和语言上趋于传统，如《铁皮鼓》般石破天惊的作品再难觅踪迹。今日之小说，叙事结构与技巧不断发展，花样翻新，德国小说似乎也须跟上世界潮流，求新求变，予以纯文学的实验作品更多鼓励与支持。

■ 书 讯

法国龚古尔奖《布罗岱克的报告》

近期出版

法国龚古尔奖作品《布罗岱克的报告》近期出版。地处德法边境、与世隔绝的小镇里，一个神秘的异乡人被杀害，小镇里惟一的大学生布罗岱克奉命起草一份报告，向上级行政机构汇报。在收集材料、调查事件的过程中，自己也是“外来者”的布罗岱克回溯异乡人到达小镇后发生的种种怪异事件，发现了小镇隐藏的许多秘密，由此一步步揭开人性的黑暗和丑陋，唤醒了自己在二战中痛苦不堪的回忆：正是被小镇居民出卖，他遭受非人的虐待，而他留在小镇的妻子也未能幸免于难，他侥幸归来，发现妻

子已经变得痴傻……布罗岱克最终完成报告，交给了镇长，可是对小镇的失望使他选择了永远离开这片寒冷的土地。小说具有浓厚的悬疑色彩，营造出卡夫卡式的黑色荒诞氛围，对人性进行了无情的拷问。作者菲利普·克洛代尔是法国作家、导演，南锡大学文学教授。2003年，他出版了短篇小说集《小机械》，获龚古尔短篇小说奖；同年，小说《灰色的灵魂》获勒诺多文学奖；2007年，《布罗岱克的报告》获中学生龚古尔奖，后又获2009年袖珍本读者大奖、2010年英国独立外国小说奖。



爱尔兰画家罗伯特·哈库斯作品

世界文坛

